



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

□ 萧放

化强调以礼相处，有礼则安，不学礼无以立。在社交礼仪中，重视“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人情互惠与邻里守望相助的温暖。某些乡村村委会通过设立关爱基金，对生活有困难的村民进行帮扶慰问，充分体现了我们“患难相恤”的人情文化传统；在当代城市化过程中，很多村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在城市社区中，如何尽快让新居民适应城市生活，就需要调动我们传统的社交人情礼俗资源，通过相互关怀与社区集体活动方式，化生为熟，在新的社区空间建立起新的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礼俗文化为现代城市社区生活与生命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生活范本与实践路径。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修身齐家”的道德修养。家庭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清正来源于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是当下提倡的新时代的文明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老人与儿童，提倡孝道与慈爱，我们通过传统的人生礼仪，敬老慈幼。其中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成人礼，成人礼是青少年走向成人的礼仪，传统冠礼强调通过成年仪式，进行“成人之道”的教育。我们今天同样倡导家庭、社会为青年人举行成人礼，以巩固其成人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培育时代新人。传统家庭文化在培育具有家国情怀的民族传承人、助力现代家庭建设与稳固社会基础方面，具有特别的社会效能。

其三，现代社会是以目标为指向的利益构成，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松散，传统文化强调利他原则，强调集体公共生活中的相互依存意识，人们运用超越个人的集体协商方式解决公共生活问题。因此，我们可充分利用传统节会庆典与集体性的民俗生活仪式，如“我们的节日”，在大家共同参与的合作互动中，甚至是比赛竞技中，比如端午节的“赛龙舟”，重新营造集体归属意识与共享的情感氛围，从而有效促进地方社会生活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连接，让现代社会生活成为具有强大内部聚合力量的共同体生活。

现代生活需要传统文化的物质资源支持

现代生活需要传统文化的物质资源支持，以丰富与满足我们日常生活的美好需求。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在山海、平原、江河、谷地等多样性空间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传统与物质产品设计加工的技艺智慧。我们因地制宜，依时令生活，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民俗饮食文化。民俗饮食传统成为当代日常生活中最鲜活的内容，如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北京的庆丰包子、嘉兴的粽子、苏式月饼、宁波汤圆、武汉热干面、新疆的手抓饭、东北的豆包、浙江的麻糍，还有各地茗茶饮品如西湖龙井、英山团黄、黄山毛峰、安溪铁观音、武夷大红袍等等，这些与地方环境物候物产密切相关联的饮食文化，不仅满足了人们日常口腹之需，同时也满足了离开故乡的人们的乡愁，为流动的中国人提供了情感慰藉。

现代社会是以工业产品为物质基础的，工业产品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了便捷，但它的通用性不能满足地方日常生活的个性需求，而传统手工艺产品具有一般工业产品不可替代的文化内涵与情感价值，人们以大红灯笼点亮节日，烘托年节气氛，以木版年画与对联装饰门庭，迎春祈福，以佩戴香包清洁身体，以手工织染满足我们对传统审美的需求。同时我们的传统庙会商贸活动，也是满足今天人们日常生活的物质条件，如北方的赶集、南方的赶街，还有各地满足人民商品交易习惯的地方传统节会，都是传统文化服务现代生活的重要途径。

传统文化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它主要是以其特有的多方面价值对现代生活予以丰富与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了精神慰藉与文化认同的归属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与前行的精神动力，从而赋予现代生活以通达美好与绵长魅力。



文化视点

首先，我们看传统社交礼俗。中国有悠久的礼仪文明，礼仪文化发达，在人际关系中，我们传统文



□ 吴传毅

石鼓书院是我国最古老、最著名的书院之一，是湖湘文化重要发源地，它始建于唐元和初年，迄今已有1200余年历史。1000余年来，它始终以藏书之丰、学风之盛、设备之全、经费之足、管理之严、成就之大而成为蜚声中外的文化瑰宝，在中国教育史和书院发展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素有“衡湘洙泗”“道南正脉”的美誉。

院以山名,山因院盛

石鼓书院坐落在湖南省衡阳市城北的石鼓山上，蒸水环其左，湘水挹其右，耒水横其前，三水汇合，三面临水，前有深潭，一峰突起，悬崖削壁，如大石屹立江心，雄伟壮丽，海拔69米，面积4000平方米。它临江负拔，山明水秀，群峰环拱，风土清旷，交通便利，近府城而远离喧嚣，连水陆要津而非通道，远近适宜，高低适度。宋代朱熹在《石鼓书院记》中描绘它是“据蒸湘之会，江流环带，最为一郡佳处”。元代黄清老在《石鼓学田记》中称赞它为“奇崛耸拔，中高而外秀，蒸湘二水左右环之，既合，荡荡浩浩，同归于洞庭。书院当二流之交，迴瀾滟渊，远嶂森列，楼阁如在虚空中，盖湖南第一之胜地也”。再加上一些文人学士凭其山之奇特，将八处胜景区为书院八景，更加显示出奇特的地理环境。院以山名，山因院盛。幽静而清雅的石鼓山，实为儒家士大夫读书养性、相聚讲学、吟诗论文的绝佳场所，而书院“藏于名山”，又使石鼓山熠熠生辉，真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悠远厚重,生生不息

石鼓书院始创于唐代。元代陈澧年在《石鼓书院》诗中有云，“石鼓名山始自唐，天开此处读书堂。”早在书院创立之前，石鼓山就成为人们游览胜地和文人联聚场所。《三国志·蜀书》载，刘备牧荆州时，诸葛亮侯以军师中郎将驻兵临蒸（衡阳的古称）、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赋以供军实，相传诸葛亮当时就住在石鼓山上。诸葛亮病逝后，为缅怀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德行，衡人就在他住过的石鼓山上修建了武侯庙（祠）以供祀享，这座历史悠久的纪念祠堂从创建时起就成为人们凭吊和眺览的胜地。唐贞观初年，刺史宇文炫在石鼓山开“东岩”“西谿”为眺览名地；唐贞元初年，刺史齐映又在山的东麓修建了著名的合江亭；永贞元年，韩愈自阳山徙江陵，与刺史邹君



会于合江亭上，留题古诗二十韵。自此，以合江亭为中心的石鼓名胜更因韩愈的留题而名扬天下，蜚声海内外；元和初年的邑秀才李宽中隐居石鼓山，辟寻真观为治学读书之所，招有志学者居观读书，共同切磋学问，并以山名院，曰“石鼓书院”，亦称“李宽中秀才书院”。时任刺史吕温公暇之余“常往访之”，与山主（长）李宽中及诸生文咏唱和。石鼓书院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所由私人创建的书院，当时一大批读书人到此求学习艺。

宋代是石鼓书院全盛时期。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李宽中族裔李士真请于郡守，愿以私财，在李宽中办学旧址上对石鼓书院进行首次重建，“前为会讲堂，中列先圣殿，后建雁居祠，东西两厢设斋舍十数间，外建仰高楼与风亭亭，复修合江亭，形成讲学、藏书、祭祀的规制，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这种学官式的建筑布局在后来历代重修中被继承下来，同时被保留的还有书院的办学传统。石鼓书院虽属私人创办，但从它创办时起，就受到官府直至朝廷的重视和支持。史载，宋朝皇帝就曾两次给石鼓书院赐额，从而使得石鼓书院声名大振，遂与睢阳、白鹿洞、岳麓三书院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

元代对书院采取保护、提倡和控制政策，书院官学化倾向越来越重。元朝末年，兵荒马乱，书院多遭破坏，后经50多年的沉寂，石鼓书院又得以修复，基本上恢复了宋时旧观。在其后的岁月里，书院规制大备，其讲学、藏书、祭祀等主要功能进一步完善，石鼓书院又再度兴盛起来。清代顺治十四年（1657年），当偏沅巡抚袁廓宇向朝廷请求修复石鼓书院时，朝廷准其所请，并由时任衡阳知县余天薄董其事。“中为武侯祠，前立大观楼，楼下为七贤祠，右为公署五楹，两厢各为书舍，规制略备。”这是清代最早恢复办学的一所书院。由于得到上自朝廷下至地方大小官吏的支持，

石鼓办学重新兴盛起来，并成为湘南一个重要的文化学术研究中心。

教化育人,经世致用

著名理学家朱熹与著名学者张栻就曾来石鼓书院讲学，共同切磋中庸之义，朱熹还撰写了《石鼓书院记》。在这篇历史文献中，朱熹对书院办学的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育重点、教学方法作了具体阐述，尤其是他倡导的将义理之学、修身之道作为书院的办学宗旨，以达到“明道义正人心”的教育目的，不仅为当时全国书院所效法，而且对元、明、清代办学都有深刻影响。

在朱熹、张栻两位大师影响下，四方学者接踵而至，盛况空前，以至“斋舍不能容，辟武侯祠居之”，成为石鼓书院学术史上一大盛事。嘉靖年间，随着阳明学派的兴起，一批学术巨子来石鼓书院讲学，使讲学之风再起，盛极一时。根据史书记载，蔡汝楠守衡阳，常以经术为治术，以书院作阵地，每逢朔望定期到石鼓书院给诸生讲良知之学。在他的倡导下，各地知名学者如湛若水、邹守益、茅坤、蒋信、李渭等相继至石鼓讲论，衡阳的曾朝节、刘尧海、伍定相、王万善等也热烈响应，“坛席甚盛”，前来质疑问难者络绎不绝，长永二郡诸生及官师举监皆负笈来学。至此，形成于南宋以来的书院“讲会”制度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并进一步发展成为有固定宗旨、固定组织、固定会期、固定规约的学术团体，石鼓书院也因此成为理学传播的中心，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思想家王夫之、旷敏本、吴时来、余廷灿、张学尹等，都先后来这里或登台传道或主持书院，从而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戊戌变法后全国兴办新式学堂时为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湖南抚院按清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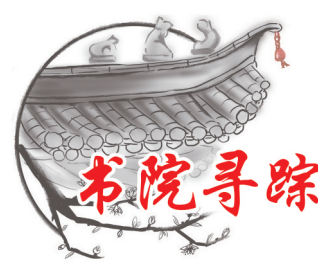
诏谕，改石鼓书院为衡阳高等学堂。1910年后又相继改办为进修女子师范学堂、衡郡女子职业学校，从此实现了学校教育向近现代历史性的转变。

精神之光,代代相传

石鼓书院自唐元和初年创建以来，历尽人间沧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经历了弦歌不绝、瀚墨流香的昌盛年代，也饱尝过满目疮痍的艰难岁月。

据历代书院志记载，石鼓书院遭兵火大面积摧毁和大规模的兴复工程就有八次。历史上最后一次重建（即第八次）是在清同治十年（1871年）。由时任“兵部侍郎、衡阳彭玉麟倡捐千金，诸好义者从而附益之，清泉候选道杨澍董督工役”，衡州知府李筠负责督办。书院最终毁于1944年日军炮火。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建议，在书院废墟上重建了合江亭、绿净阁，修建了护栏、山门和早桥，并将它辟为公园，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大修大建。

2006年4月，衡阳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举社会各方之力，重修石鼓书院，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重视对历史人物的充分挖掘、凸显乡贤、名宦、大儒的文化痕迹，依托石鼓山奇峰和蒸、湘、耒三水环流的自然风景，从“显山、露水、见秀”的思路出发，通过对地方史志的调查、考证和对石鼓山地形地貌的勘察，巧妙布置山门、书舍、武侯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合江亭等建筑，着力体现“古、幽、曲、静、绿”的建设元素，使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二者错落点缀、浑然一体。重修后的石鼓书院整体布局为中轴对称，整个仿古建筑群为白墙黛瓦深色柱，主要材料是优质木材和麻石，庄重、典雅，有着浓厚的书院文化氛围。重修的石鼓书院通过征集刊刻名家楹联、碑帖，陈列布展名人孔夫子、诸葛亮、李芾等雕塑、泥塑、祭器等，让诸贤有“声”有“形”于石鼓，石鼓书院借名人美誉和名篇佳作垂光于世。石鼓书院孕育的教化育人的优良传统，博大精深湖湘文化以及敢为人先、经世致用的精神特质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



书院寻踪

稷下学宫的文化魅力在哪里？

□ 汪霏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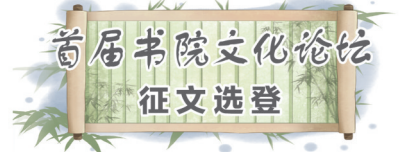
生。齐桓公在位的十几年里，来自稷下的学说日见盛行，并充盈着四周。推崇“无为而治”的齐桓公最终没能救赎自己的病体，但他却成功救赎了新生的田氏政权。同时，一段“东方雅典学派”的传奇也就此开始。稷下学宫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真正的第一所大学，第一所学术思想自由、学科林立的高等学府。作为战国时期学术中心与教育中心的稷下学宫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游学为主，来去自由；各家并立，平等共存；百家争鸣，自由辩论；相互吸收，融合发展。在战国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文化土壤中，稷下学宫集智囊机构、学术中心、教育中心于一体，一时教学相长，迅速成为战国时期各学派交流荟萃之地，营造了百家争鸣的浓厚学术氛围。

随着齐国日趋强盛，稷下学宫也进入了鼎盛时期。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之道开始显现出局限性。齐国统治者迫切期望出现新的思想。雄心勃勃的孟子两次来到闻名遐迩的稷下学宫，先后与齐威王和齐宣王会面，

著名的“稷下论战”便由此爆发。一边是名震天下的儒学宗师，另一边是求贤若渴的理想明君，这样的结合令人遐想。然而，孟子所代表的儒家理想主义思想并不能迎合战国时代的现实环境。在荀子的努力下，稷下学宫重新繁盛。荀子以儒学为根本，但却对儒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如果说，儒家的理想主义者孟子的学说还有些迂阔不切实际的话，那么，作为儒家现实派的代表荀子为这个世界勾勒的美好蓝图显然要更为谨慎和理性。作为稷下的遗产，那些在此游学的弟子以及激辩于此的各派学说，渐渐地流布天下，并在动荡变革的时代中慢慢融合发展，最终在汉初儒生的手中捏合成了一种“大一统”思想。从此，它奠定了汉文化的最初基调，并影响了此后近两千年里中国文化的道统走向。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重要阵地，是中华文化兴盛发展的典型代表。由此形成的稷下学术精神，主要表现为：关注现实、明道救世的务实精神，兼容并包、相互

交融的包容精神，彰显个性、实现价值的主体精神，以人为本、重视民生的民本精神，尊道贵德、礼法并重的和谐精神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的整体文化结构是儒释道互补，在这所“奇异”的学宫里，一切都是灵动起伏的，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常常也沉淀着很多“家”，自由自在、或明或暗地延续着稷下学宫的丰富、多元和互融。“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与自然光源不一样，精神光源不具备直接照临山河的功能，必须经过教学和传播机制的中转，才能启迪民众。因此像稷下学宫和雅典学园这样的平台，足以左右一个民族对于文明光亮的领受程度。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对临淄那个老城门下的废墟有着深深印记。



首届书院文化论坛
征文选登